

【學術會議報導】

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綜述

鄭炳林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徐曉麗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博士生

二〇〇一年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是由蘭州大學、南華大學、密西根大學聯合舉辦，由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承辦。會議於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三日—十四日在蘭州大學逸夫館舉行，與會代表九十餘人，其中大陸代表三十餘人，台灣地區代表四十餘人，國外代表十八人。本次會議得到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學術會議和南華大學經費的資助。

會議開幕式由蘭州大學副校長楊恕教授主持，蘭州大學校長李發伸教授致歡迎詞。李發伸校長介紹了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的歷程，從一九七九年到現在，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發展成爲國家敦煌學博士學位授權點、省級重點學科、國家首批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蘭州大學與南華大學、密西根大學聯合舉辦這次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研討會，針對敦煌學研究中的難點和薄弱點，聯合攻關，協作交流，使敦煌學研究水平提高到一個更高的層次。南華大學依空法師、美國密西根大學端木三教授分別講了話，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郝春文教授還宣讀了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教授和秘書長柴劍虹教授的賀詞。

季羨林教授的賀詞是：「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鄭炳林教授：欣聞『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即將在蘭州舉辦，十分高興。我因年齡等原因，不能親赴會場聆聽與會諸君鴻談高論，深以爲憾。特請柴劍虹、郝春文、榮新江教授轉達我對研討會的祝賀和對與會代表的問候及敬意。敦煌佛教文化的研究我們有優勢，卻又並非我們的強項，因此這次研討會受到海峽兩岸學界的共同關注和國外學者的支持就有了特殊的意義。我去年六月在北京的研討會說過，敦煌學已走過近百年的歷程，但研究的任務完成了恐怕還不到一小半，新世紀任重道遠；而且這些任務主要靠現在的中青年學者來承擔，故而蘭州大學敦煌學重點研究基地的建立，令人歡欣鼓舞。我相信你們在敦煌研究院和全國敦煌學研究者的積極支持下，

一定能夠為敦煌學事的發展做出令世人矚目的貢獻，謹祝研討會圓滿成功！祝代表們考察勝利、身體健康！季羨林，二〇〇一年七月八日。」

柴劍虹教授的賀詞：「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會議主席、各位代表：首先，我要衷心感謝蘭州大學敦煌研究所熱忱邀請我參加這次研討會，也為不能如期與會而深表歉意。我認為，新世紀第一次國際性敦煌學研討會由蘭州大學敦煌學重點研究基地舉辦，這在敦煌學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這不僅是因為在敦煌學的故里建立基地對培養敦煌學研究人才十分關鍵，而且因為這次會議是在世人已有可能全面把握藏經洞敦煌文獻的新條件下，將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的研究全面推向深入的一個良好開端。祝大會圓滿成功！祝諸位代表考察順利，身體健康！柴劍虹，二〇〇一年七月十二日於杭州。」

南華大學依空法師則說：「敦煌寶藏不僅是中國文化藝術的瑰寶，也被聯合國指定為人類文化藝術的遺產，是全人類共同擁有的珍寶。感謝蘭州大學給南華大學一個參與的機會。大會提出的論文非常全面，包含宗教、語言、文化、藝術等各方面。欣逢大西北開發的時刻，能在蘭州大學舉辦敦煌學國際學術會議，更是深具意義。這次我們的代表除台灣外，甚至有來自美國、紐西蘭、澳洲、香港等地。本次會議是二十一世紀所舉辦的第一次敦煌學國際性會議，希望在未來此類型會議能永續召開，更希望未來也有因緣，可以在星雲大師所創辦的南華大學召開敦煌學會議，最後祝大會圓滿成功。」

本次會議是敦煌學界首次將敦煌佛教作為主題中心深入研究的國際性會議。

此外甘肅省人民政府台辦、甘肅省文物局等領導也參加了會議。

在接著進行的六次專題報告會場上有二十餘名學者作了專題發言。本次會議收到了來自國內專家學者的主要研究成果五十八篇，主要體現在對佛教藝術與文化的突破性研究上。敦煌佛教藝術歷來引起國內外學者的高度重視，本次會議有多篇論文涉及，與會專家、學者從不同的視角，採用全新的研究方法對佛教石窟建築藝術、造像藝術、雕塑藝術、壁畫藝術、書法藝術及剪紙藝術作了較為詳盡的探討。石窟藝術方面的討論內容十分豐富，特別是敦煌佛教石窟藝術與印度、中亞藝術以及周邊民族藝術的關係、敦煌壁畫與中國傳統繪畫之間的關係、以及傳統的敦煌藝術與敦煌佛教藝術之間的關係等專題研究吸引了許多學者。

敦煌石窟藝術是中華文化的瑰寶，也是世界藝術寶庫的奇葩。對於敦煌石窟藝術的淵源流變是中外學者歷來關注的課題。圓光佛學研究所賴文英「北傳早期的法華三昧禪法與造像」，從文獻及造像資料，論述了北傳早期的法華三昧禪法與造像之間的關係，主要依據河西炳靈寺一六九窟的西秦壁畫出現與《法華經》有關的釋迦佛、多寶佛並坐像，敦煌二五九窟釋迦佛、多寶佛二佛並坐像，來研究造像與禪法之間的關係，說明法華造像正體現了北傳早期法華三昧禪法「法身不遷」、「三世不遷」、與「因果不遷」的思想內涵。

圓光佛學研究所賴鵬舉「犍陀羅的大乘法身思想及其在中亞、河西地區的開展」，通過對犍陀羅後期的「法身」造像、四世紀後半葉中亞「那揭國」「佛影」造像、炳靈寺一六九窟的「法身」造像及五世紀初廬山慧遠的「佛影」造像等一系列佛教造像的研究，闡述了犍陀羅的大乘「法身」思想及其在中亞、河西地區的開展，認為紀元後西北印地區形成的以釋迦佛為中心的「念佛三昧」是北傳大乘佛教的起點，西元三、四世紀大乘「法身觀」在北傳地區展開是「念佛三昧」禪法往大乘層面提升最關鍵及最全面的發展，大乘「法身觀」的進一步開展則是由四世紀末五世紀初中亞的羅什與中國的道安、慧遠加以接續。總之，作者認為以「般若」開展「法身」思想，由「法身」思想形成「念佛三昧」的造像與禪法，成為「北傳大乘」爾後發展的主要體質。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鄭炳林、沙武田先生「麥積山石窟北朝雕塑藝術體現的佛教人間化傾向」，從天水麥積山石窟北朝塑像藝術的表現手法來探討佛教人間化傾向，論述了麥積山石窟北朝塑像藝術主尊造像的原型選取風格，菩薩弟子人格化的藝術造像，麥積山北朝塑像藝術凡聖合一的整體佈局以及麥積山北朝塑像藝術與中國傳統建築藝術結合等一系列問題，並從北朝時期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時代共性方面來分析麥積山石窟北朝塑像藝術所體現的人間化傾向的表現及其歷史原因，認為麥積山石窟等北朝佛教造像藝術人間化傾向具有時代共性，這種傾向正體現了當時的社會歷史關係、人們的心理需求、精神追求及審美價值取向。

俄亥俄大學的 Tom Suchan 先生「從四川毗沙門天王形象看晚唐及五代時期的軍事」，在前賢研究基礎上，對唐宋時期四川佛教神毗沙門天王像及碑文做了進一步有益的研究，主要內容有：1.簡要介紹中國、中亞毗沙門天王崇拜以及佛經中的形象和毗沙門天王在佛教宇宙觀中的地位；2.以中國其他地方所發現的相關體裁考察四川毗沙門天王像；3.根據晚唐及五代時期的軍事情況對該形象進行背景分析；4.探討十一世紀後四川窟寺中明顯缺少毗沙門天王新形象問題，並論述了該神與唐朝軍事的緊密聯繫。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沙武田、陳明「莫高窟第九十八窟及其對曹氏歸義軍時期大窟營建之影響」，則博採前賢的研究成果，擴大了對九十八窟的研究範圍。和以往研究不同的，是該論文突破對九十八窟窟主、創建與建成年代關係、歷史背景等方面問題研究，而著重研究九十八窟對五代宋曹氏歸義軍時期敦煌莫高窟的營建，特別是諸大窟的營建產生的深刻影響。作者採用對洞窟的局部研究與整體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對諸如窟主、崖面位置、開窟背景、洞窟稱號、洞窟形制、壁畫內容及其佈局、畫院、壁畫底稿程式化、社會化等方面問題加以仔細探討，從而找出九十八窟與一〇〇、一〇八、六十一、五十五、二五六、四五四、五十三、二十二、一四六等窟之間的關係，這對我們進一步認識與研究莫高窟將有所裨益。

敦煌壁畫的研究一向是令人關注的問題，許多學者著力研究敦煌壁畫藝術與中國佛教文化的傳承流變之間的關係。本次會議也有新的成果。哈佛大學的那塔莎·海勒「居家建築及法華經變的視覺結構」一文，主要基於對莫高窟二一七窟、二十三窟、一五九窟、八十五窟、六十一窟和九十八窟的法華經經變的分析上，尤其是集中在對幾幅法華經變中「窮子喻」

的建房及其父房舍的分析上，通過視覺處理分析來看圖像的整體結構，以研究建築的比喻描繪，並說明它們表現與解釋上的創新性。

密西根大學的阿曼達·古德曼「敦煌一五八窟涅槃故事本土化的證據」，通過對一五八窟佛涅槃不同視覺描繪，從歷史的角度審視了該窟涅槃圖的本土化範式，認為一五八窟的佈局和設計及其規模與年代表現了吐蕃的影響。尤其是在圖像設計上的變化反映了當時社會和政治上的變化。該文參照了大量寫本和圖本資料探討了寫本和圖本之間的關係。

俄亥俄州立大學朱天舒「中國佛教藝術裡的須彌山圖像」，對敦煌的唐代壁畫保留的最為豐富、最為精美的有關須彌山的藝術作品進行分析，綜述須彌山的圖像在佛教藝術中的出現與發展，探討其在不同時代的形制特點和在佛教發展變化中的相應意義。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殷光明「試論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對敦煌盧舍那佛像的分佈，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的內容及義理，敦煌盧舍那佛法界圖像的藝術特點都做了較為全面的闡述，並通過對敦煌盧舍那佛像興起、盛行和衰落過程的研究，揭示其深刻的歷史、文化背景。因此，敦煌的盧舍那佛圖像不僅是研究我國這一圖像興衰、演變的形象資料，也是研究這一圖像在我國的傳播，華嚴思想流傳的重要資料。

利用敦煌壁畫民族史料研究中古時代敦煌少數民族問題，是學術界歷來關注的研究領域。陸慶夫先生「敦煌壁畫與西北民族」，從總體上指出敦煌石窟藝術是古代西北各族共同傑作，因此，敦煌壁畫對研究西北少數民族具有極其重要的史料價值。

本次會議除直接討論敦煌佛教藝術外，還對與此相關的藝術進行探討，甘肅省敦煌研究院謝生保「敦煌莫高窟發現的剪紙藝術品」，考證了藏經洞出土的八件藝術剪紙和九朵彩色紙花、莫高窟北區出土的七件藝術剪紙和兩件紙錢，是唐五代作品，並對其性質和用途作了考證。為中國民間剪紙史的研究提供了極為珍貴的資料。

淡江大學王志銘「試論敦煌書法的藝術價值」，對敦煌佛教寫經書法進行了仔細研究，確認敦煌寫經書法藝術是敦煌佛教藝術重要組成部分，對佛經書法藝術的研究將有助於對佛經本身的研究與理解。

敦煌佛教文化博大精深，其中對佛教文獻、佛教信仰、佛教法事活動、僧人活動情況及佛教本身的傳承流變等領域的探討也是本次會議的焦點，這是學者們潛沉於敦煌歷史文化中不斷開拓發掘的結果。尤其敦煌佛教文獻的研究歷來得到學術界的重視，此會有多篇論文涉及。尤其南華大學永有法師「敦煌遺書中的金剛經」一文，從七十六項金剛經及十七個與金剛經相關的文獻題記入手，指出金剛經遺書的書寫製作年代，歷經隋、唐五代到宋朝，跨越了五世紀，金剛經遺書本經製作的三種樣式即寫本、印本和拓本，金剛經遺書的書寫、製作或供養者為僧俗二眾各階層的人，上自皇帝高官貴族，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此外，作者還對金剛經題記中的祈願，金剛經的流傳地區問題加以研究，其總目的是為了說明金剛經由印度

傳入中國後，它已不只是一部翻譯成中文的佛教經典，而是緊緊地和中華文化結合在一起，深深地植入和影響中國人的文化和生活的一種文化現象。

中正大學鄭阿財「敦煌寫本『九想觀』詩歌新探」，就 S.6631、P.3829、P.4597、P.3022、DX.3018 及上海博物館藏四十八等六件敦煌本「九想觀」詩歌進行系統分析，同時結合唐詩中的其他九想觀詩以及日本流傳的蘇東坡「九想詩」與「九想詩繪卷」等資料相互比較，並通過各寫本九想詩與佛典中有關九想觀源流的追溯與對照，藉以探討唐、五代九想觀詩歌流行與內容、名目變異的原因。認為佛教的「九想觀」，自原始佛教到大乘佛教的倡導，一直是修行的主要禪觀。而自隋唐成為「止觀」的主要部分，唐以後，九想觀漸由實踐的教理轉趨世俗化。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杜斗城「流傳於日本的《十王生七經》與《地藏十王經》」，該文對這兩種經卷的內容和圖像與敦煌本《佛說十王經》做了相關比較，考證了這兩種經卷出現的年代，糾正了以往對這兩個經卷的誤釋。

陳廖安先生的「敦煌出土的《壇經》抄本」一文，從敦煌本《壇經》的組織結構、異文用詞、禪法大要等入手研究、遍參通核、緝比整次，略作綱紀，使我們可通觀《壇經》之梗概。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楊富學「敦煌本《歷代法寶記·弘忍傳》考論」考釋出該傳成書背景及立傳宗旨在於褒南宗，揚劍南禪，而貶抑北宗，指出該傳有意篡改弘忍十大弟子的名次排列，以提高惠能、智詵的地位，而降低神秀等人的地位與影響這一特點，此外，還對弘忍事迹的記述及弘忍卒年都作了具體分析與考證，這些對研究唐代禪宗文獻與禪宗史都是極有意義和價值的。

對敦煌文獻進行文字校勘、詞語考釋是敦煌文獻研究的傳統領域，此次會議有的學者對敦煌文書中出現的微妙變化的語言辭彙進行考釋。中正大學中文系竺家寧「敦煌卷子 P.4663 辭彙研究」對敦煌卷子 4663 文字、詞語進行研究，提出特別值得深究的複合詞如：威曜、鹹尋、慧誼、班宣、景模、諸通慧、道誼、道慧、滋育、差特、觀念，從漢語辭彙史角度研究早期佛經。

密西根大學端木三「現代語言學理論和漢語言學」，採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從語言的特性入手，以語言的差異為重點，以英語和漢語為例，討論它們共有規律，並說明對任何一種語言的研究，都可以促進對別種語言的研究以及語言學的理論的研究。這種對不同語言之間的共性研究，找出語言普遍規律的研究方法，為我們解決敦煌文獻以及敦煌學研究中語言的問題提供寶貴的借鑑。

本次會議有的學者還通過研究敦煌佛教文獻，探討相關的問題，揭示敦煌佛教文獻多方面的價值。敦煌研究院胡同慶「論古代敦煌環保意識基礎及其與現代大西北可持續發展之關係」，文中列舉了大量而且以生動形象表現佛教輪迴學說的「五趣生死輪圖」、「尸毗王割肉貿鴿」、「九色鹿本生故事畫」等敦煌壁畫，把敦煌壁畫中反映古代敦煌人的環保意識與現代人的環保意識相比較，認為敦煌壁畫和佛教經典中宣傳眾生平等和因果報應是敦煌佛教環保意識的思想理論基礎，其意義在於佛教教人作善業要「長期修持」，這種長期修持作善業自然就有可持續發展的性質；此外並提出只有構建現代的環保意識，才有利於環保行動和環保建設的持續發展。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陳麗萍「敦煌寫經題記中所反映出的婦女問題」，從敦煌寫經題記入手，找出一切與女性有關的題記，總結分析當時敦煌女性的具體要求及活動情況，從而研究古代敦煌地區女性心理、女性社會地位以及女性生活。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徐曉麗「回鶻天公主與佛教」，採用個案研究方法，利用大量反映這位回鶻公主佛事等活動的敦煌文獻，考察天公主在敦煌生活狀況及社會地位，從另一視角揭示曹議金與回鶻天公主的婚姻實質。

有關佛教信仰方面的內容，本次會議也多有涉及。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公維章「明清時期河西的民間觀音信仰」，從佛教石窟的觀音塑像、畫像出發，考察了明清時期河西地區的民間觀音信仰，指出明清時期河西地區民間觀音信仰的流行，尤其是送子觀音信仰的興盛。

敦煌研究院劉永增「阿彌陀經的光明信仰與藥師經的審判思想」對敦煌莫高窟出現的大幅經變畫中，阿彌陀經變多畫在南壁，藥師經變多畫在北壁這一現象入手，對阿彌陀信仰的起源及其光明信仰，藥師及其審判思想加以探討，認為這兩種信仰原出自西北印度，與波斯祆教的光明信仰和審判思想相似，莫高窟初唐以後多畫阿彌陀和藥師兩經變，意在既可不墮地獄又可往生淨土，是一種特有的雙重信仰。

對於佛教僧人活動情況的研究，本次會議有多篇論文涉及。高啓安「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戒律初探」，以「不食肉戒」為中心去研究探討僧人的飲食戒律，作者通過對唐五代敦煌僧人飲食狀況詳細而系統地研究，認為敦煌僧人是遵守不食肉這條戒律的。

馮培紅「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周邊地區之間的僧使交往」，論述了晚唐五代宋初歸義軍時期敦煌與周邊地區之間的僧使交往，僧侶或以其獨立的使團，或作為外交使團中重要成員，在歸義軍與甘州回鶻、于闐、西州、南山等地政權交往中，或中原王朝及周邊政權與敦煌的聯繫中，都起了極其重要作用，他們充當了政治外交與文化傳播的使者。

王騰「絲路名僧與中外文化交流」，將中國傳世史乘與西域出土文獻相結合，指出佛教文化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僧人作為佛教文化傳播載體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像竺法護、曇無

識、鳩摩羅什等高僧大德，他們沿途傳譯、駐留授經，傳播了佛教文化，促進了佛教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的交融。

陸離「吐蕃僧官制度試探」，對吐蕃僧官制度作了探討，指出吐蕃僧官制度體系為：全國佛教宗師是主管佛教事務的最高僧官，在中心衛地和各邊地都派有規範師，在下設有寺院主持與供應長老，在河隴地區各節度使轄區設有節度使轄境都僧統（都教授），在轄下各州則設有州都僧統（都教授），下面又有都判官、都法律、判官、法律、寺三綱各級僧官，這樣，就形成了一套完備的僧官體系。吐蕃僧官制度對歸義軍、西夏、元朝僧官制度以及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都產生了深遠影響。

關於佛教在中國的傳播發展歷來是學術界極為重視的話題。與會學者對佛教的傳播特點、傳播方式、傳播途徑等問題的研究給人以新的啓迪。武漢大學陳國燦「從敦煌吐魯番所出早期寫經看佛教的東傳西漸」，認為佛教傳入中國，佛經經義的翻譯傳播，最早不是發生在敦煌、吐魯番，而是發生在中原的政治生活中心地區，如長安、洛陽以及建康。這些被譯出的佛經，又逐漸向西傳到河西、敦煌、吐魯番。佛經傳譯的這種東傳西漸的過程，賦予了敦煌吐魯番寫經主體上的中國文化特徵，反映在佛教藝術上，也越來越顯現中國藝術特點。

敦煌研究院李正宇先生「唐宋時期的敦煌佛教」，指出了唐宋時期敦煌佛教，是別具典型的中國化、民族化、世俗化的佛教。作者根據其性質、特點、播佈、滲透的實際情況稱之為「敦煌世俗佛教」，其有如下特點：1.從超世脫俗轉變為入世合俗；2.重信行不重義理；3.是法平等，無宗無派；4.真經偽經一起尊奉；5.生活中有種種突破清規戒律的行為，另一方面不斷的「懺悔」、「回向」。唐宋時期的世俗佛教揭開了我國佛教革新的重要篇章，為研究當代「人間佛教」提供可尋線索。

曲直敏「從圖書目錄看漢唐之際佛教的漸進」，從史部文獻目錄的分類及其對佛教文獻的著錄，佛教目錄對佛教典籍的著錄及分類，儒、佛類書目錄的分類，對漢唐之際的佛教演進及其與中國儒家文化之間的關係予以闡釋，認為佛教從漢代傳入中國，自魏晉南北朝至隋，佛教才進入中國思想文化的權力話語領域，唐代以後，融入了中國的思想文化體系之中。

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王愛和「摩醯首羅卜性質初步分析」，指出摩醯首羅卜是中國南北朝時期北地僧人創造的，旨在教化的卜書，其依託是當地的實際信仰和當時通行的卜書體例，具有中國觀念、中國模式；其中對女神體系的構建，反映了當時婦女對佛教的有力支援，對傳統「易」占六十四卦的化用，體現出外來文化向當地文化正宗靠攏的心理。這種文化狀況，是佛教傳播有了一定程度、融而未化時期特有的，說明佛教以其調適實施滲透的傳播過程。

蘭州大學劉文江「西域方術東傳及其影響略議」，指出佛教在中國傳播過程中，天竺方術成爲佛教徒傳播宗教的重要手段，並認爲它對中國底層民間生活影響很大，爲中國文學中的誌怪、傳奇、神魔小說提供豐富的素材。

西北民族學院牛宏「藏傳佛教噶舉派「那若六法」淺析」，在總結中外研究成果的基礎上，細緻地分析了「那若六法」的含義、修行方法及特點。並總結出六法有以下共同的特性：1.在哲學思想上表現出力圖調和「有無」矛盾地二元傾向；2.六法之間相互融合、互爲補充，成爲有機的整體；3.六法的修行十分強調心理、生理的實際作用。作者目的是向我們說明由印度僧人那若巴總結創建的「那若六法」，是藏傳佛教噶舉派傳播佛教的重要密法，使我們瞭解藏傳佛教傳播流變的又一獨特之處。

石窟考古歷來是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本次會議有些論文報告了敦煌考古的可喜新收穫。敦煌研究院馬德「莫高窟新發現的窟龕與墓塔遺迹」，作者在對莫高窟周圍新近發現的大泉河東岸窟龕遺迹、東岸戈壁上的古代墓塔遺迹和城城灣地震台窟龕遺迹，這三處遺迹實地考察的基礎上，認爲大泉河東岸窟龕遺迹可能就是敦煌文獻中記載的「赤岸窟」，城城灣窟龕遺迹是比莫高窟還要早的佛教活動場所，東岸戈壁上的墓塔遺迹可能是莫高窟古代的「塔林」，並對這三處遺迹開發建設提出未來構想。因此，這篇論文不但具有學術價值，而且具有現實意義。

北京大學榮新江「再論敦煌藏經洞的寶藏——三界寺與藏經洞」，對已經發表的藏經洞材料進行整體上研究，探討分散在世界各地零亂的資料原本的內在聯繫，從而對敦煌文獻加以整體上認識，這就爲我們從總體上探討敦煌藏經洞文獻和文物原本的性質提供可能。該文在總結以往研究成果基礎上，較爲全面、系統地又一次闡述了三界寺及藏經洞有關問題，確定三界寺就位於敦煌莫高窟前，推測其原址應當在最近重新翻修過的下寺或附近，關於藏經洞寶藏的性質，認爲它們原本是三界寺的供養具，包括經帙、經卷、繡像、幡畫等文物和文獻材料。顯然，這篇文章對我們於正確判斷敦煌文獻的價值並恰如其分地使用它們提供了寶貴的建議。

最後，大會還討論了敦煌學在國際研究發展的不同學派以及一些新的研究方法。美國 Aida-Yuen Wong 「敦煌學與東方歷史學京都學派」，介紹了敦煌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學派，即這一學派是以京都大學的學者們爲中心，其特點是主張使用原始資料，詳細論述敦煌文獻在其形成環境中的價值，注重培養研究人員所必須的語言能力。東方歷史學京都學派的研究方法，對研究敦煌學的日本學者及亞洲學者都有著重要影響，成爲研究敦煌學一支強勁的力量。

甘肅工業大學李重申「尋求中國和敦煌武術的突破點」，以中國武術如何走向世界爲主題，採用文獻資料、調查研究等方法對中國和敦煌武術文化進行分析，並結合西方文化的特點和現代體育的精神，來比較兩種不同的文化之間的差異，使人們深入瞭解武術的本質。這種把文獻資料與實際調查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是近些年來對敦煌學研究的有益嘗試。

會議期間還舉行了《普門學報》主編與大陸學者座談會，會上依空法師、滿果法師就《普門學報》辦刊宗旨、發展狀況作了詳細的介紹，希望大陸學者在佛學研究上同《普門學報》加強協作交流，將高質量的佛學研究成果投給《普門學報》，共同促進佛學研究的深入發展。

會後，國外代表乘機到敦煌莫高窟進行為期半個月的敦煌藝術研修班；台灣普通團乘機經烏魯木齊、敦煌、張家界返回台灣。專家團與部分大陸學者乘汽車經武威、張掖、嘉峪關、敦煌、西寧等地進行了為期七天、行程三千公里的學術考察研究，沿途考察了天梯山石窟、馬蹄寺石窟、安西榆林窟、敦煌莫高窟和武威文廟、雷台漢墓、張掖大佛寺、嘉峪關長城、鳴沙山月牙泉、塔爾寺文物古迹，瞭解河西走廊的綠洲戈壁與柴達木盆地的荒漠地貌，參觀了高原草原和青藏高原明珠青海湖。沿途陳國燦教授等為台灣學者作了歷史人文的講解，更增加了這次學術考察研究意義。

總之，這是一次繼往開來的具有較高學術質量的國際學術會議，本次會議取得的主要收穫，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展現了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方面的最新成果，加強今後的協作研究

本次會議中，中外學者發表了大量高質量的最新研究成果，涉及到了敦煌學的諸多領域，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本次會議，使他們的成果得到驗證，為今後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基礎。同時也使與會各國、各地區之間的敦煌學者加強了聯繫，以學術增進交流、增進友誼。李發伸教授、依空法師、端木三教授在會議開幕式講話中提到加強學術交流，開展合作研究的願望和重要性。部分大陸學者通過這次會議已經同台灣地區和國外的學者開展了合作研究。同時蘭州大學與南華大學意向將在絲綢之路石窟佛教藝術等方面開展多方面的合作研究，爭取出產一批標誌性的研究成果。雙方將在聯合召開學術會議、學術研究、敦煌佛學研究人才培養上繼續合作。

二、顯示了國際敦煌學在佛教藝術與文化研究方面發展的新動向

由於中外學者的不斷努力，敦煌學研究領域不斷拓展、深化。本次會議不僅涉及到以往的傳統研究領域、如敦煌石窟藝術、佛經考釋、佛教信仰、佛教傳播發展史等，還對一些新的佛教藝術領域，如敦煌剪紙藝術、敦煌寫經書法藝術、敦煌武術等領域加以研究，更為重要的是，此次會議還在以往的研究成果上有所突破，如再論敦煌藏經洞的寶藏，在博採眾長的基礎上，提出自己的見解，給人以新的啟示。

三、研究方法不斷推陳出新

本次會議的學術論文研究，十分注重以新的視角、新的思維、新的方法去探討相關問題，有的學者以微觀入手，對一個具體問題進行研究，如對敦煌遺書中某一佛經、某一造像的闡

釋，顯示以小見大的特徵；有的學者以宏觀研究的方法，概述敦煌佛教傳播發展與淵源流變；有的學者立足於敦煌佛教史料，研究敦煌佛教與敦煌社會之間的關係；有的學者用比較研究的方法，探討敦煌的地域文化與中國本土文化之間的關係；有的學者採取比較研究的方法，探討東西方佛教藝術的不同特徵；有的學者運用實地調查與文獻結合的方法，去研究莫高窟的有關問題；還有些學者將敦煌學佛教藝術與文化的研究和現代問題研究結合起來，為解決現實問題尋找出路。總而言之，所有這些有益的探索與研究都將會是我們今後研究敦煌學寶貴的經驗與財富。

四、敦煌學研究隊伍的不斷更新壯大

與會學者中，除了有從事敦煌學研究多年的老學者，也有近些年加入敦煌學研究的青年學者，台灣地區的與會學者及其提交的會議論文，顯示了他們對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方面研究濃厚的興趣與實力。美國的與會學者及論文嶄露了他們在敦煌佛教藝術與文化方面研究的新成果。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所作為本次會議的承辦單位，向會議提交了大量的有所創新的學術論文，說明了他們在這些方面研究所作出的努力，也顯示了他們近些年對敦煌學人才的注重和培養。

總之，二十一世紀是敦煌學興旺發達的時期，我們所作的努力與探索任重而道遠，我們期待著新的研究成果不斷出現，敦煌學不斷繁榮與發展。有國內外專家協作研究，有像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會長季羨林教授、佛光山寺創始人星雲大師等名家的全力支援，蘭州大學敦煌學研究基地將會呈現光輝燦爛的發展前景。